

方盛良 著

清代扬州徽商与东南地区文学艺术研究

——以『扬州二马』为中心

博
雅
文
丛
文
雅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方盛良 著

清代扬州徽商与东南地区文学艺术研究

——以『扬州二马』为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扬州徽商与东南地区文学艺术研究:以“扬州二马”为中心/方盛良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博雅文丛)

ISBN 978-7-02-006944-6

I. 清… II. 方…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扬州市—清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4674 号

责任编辑:胡文骏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李 博

清代扬州徽商与东南地区文学艺术研究

方盛良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6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875 插页 2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978-7-02-006944-6 定价 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文化研究无疑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热点,我这里所说的主要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我们欣喜地看到,对于某些文学现象的“文化观照”或“文化解读”(透视),确实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不过,这一类著作读多了,我也有一种想法,即相关的研究很容易落到一个套路中去。最明显的问题是,不管是谈唐代,还是谈宋代,甚至谈明清,有时候,文学现象不同,可是某些著作所赋予的文化解释思路却经常大同小异。这就不免引起怀疑:是不是我们有时也会滥用了“文化”这两个字?

照我看来,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固然有不少共性,但既然是面对不同的现象,则就具体的研究来说,找出个性,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方盛良博士的这部《清代扬州徽商与东南地区文学艺术研究》出版。这部书所讨论的主要是“扬州二马”与当时文学艺术发展的关系,涉及到商业文化与文学的互动。马曰琯和马曰璐兄弟都是寓居于扬州的徽商。徽商和扬州的关系,自明代以来,便十分密切。作为一座商业城市,扬州的繁华并不始于明代,但经过了宋代的萧条,扬州自明代开始了其又一次的繁荣,却是事实,而这一切,和徽商也不无关系。万历《扬州府志·序》就说:“扬,水

国也,聚四方之民。新都最,关以西、山右次之。”陈去病更直截了当地说:“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五石脂》)徽商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具有强烈的文化追求,他们自己不一定都善于属文,但大多喜欢交结文人。这一现象从明代就开始了,陈继儒在其《冯咸甫游记序》中就记载说:“新安故多大贾,贾啖名,喜从贤豪长者游。”(《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十三)说是好名,固然有理,但也不排除发自内心的喜爱,就如同明代的一个徽商吴文明所说的:“吾虽游于贾,而见海内文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十七《吴龙田生传》)不过,贾而能儒,贾而能文的现象亦屡见而非一见,“扬州二马”尚是后出,他们的生活形态只是明代中叶以来徽商、特别是寓居扬州的徽商的一个缩影。

这里更应该提到的是“扬州二马”的书商身份。“扬州二马”以“小玲珑山馆”而著称于世。“小玲珑山馆”主要是以藏书楼的形象而引起人们赞叹的,因为这里曾吸引了不少文人学士前来读书,如厉鹗即在此居住多年,完成了多部重要著作的撰写。其实,“小玲珑山馆”同时也还刻书,盛良即对此多有勾稽,如指出《四库全书》中曾采用了马氏所藏并翻刻的三种珍贵文献:《干禄字书》、《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扬州二马”的这种行为模式,倒让我想起了南宋书商陈起。陈起在当时,既藏书,又刻书,对那些无力购书的江湖诗人,还借给他们看,在这方面,“扬州二马”真是可堪一比。

同陈起一样,“扬州二马”与当时的文学生态关系非常密切,即使还赶不上陈起的“江湖指作定南针”,至少也能介入当时创作的主流,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文坛的风貌。写《扬州画舫录》的李斗曾经指出,“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

及郑氏休园为最盛。”(《扬州画舫录》卷八)。我们知道,厉鹗寓居“小玲珑山馆”时,曾经写出了《南宋杂事诗》,可见,“小玲珑山馆”所藏的南宋典籍不在少数,而厉鹗正是发扬朱彝尊的主张,大力提倡南宋词风的。盛良在书中已经指出,马曰琯《嶰谷词》共选录其一生词作四十二首,其中有三首与厉鹗直接相关,而具体考察《嶰谷词》,马曰琯的交往又不仅仅是厉鹗,当时的不少名公雅士,在他作品中都时有出现,他的集子也有意识地把彼此的唱和之作收录进来。对此,似不能简单地以附庸风雅来判断。南宋的陈起,以其对晚唐诗的嗜好,包括对晚唐小集的选择性刊刻,影响了一大批江湖诗人的美学趣味,而“扬州二马”的这些文学活动,当然也对推动文坛风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文学与商业的关系,近年来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切关注,就个人所见,韩结根的《明代徽州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陈书录的《儒商及文化与文学》(中华书局 2007 年版),或集中于地域,或致力于思辨,都有新鲜的思路。而方盛良博士的这部著作,以两位徽商背景的文人作为中心,缜密考订,细致辨析,在士商互动的关系中,勾勒出一个独特的文学文化场景,值得研究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学者认真看待。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扬州二马”虽然当时名头很响亮,但事迹却非常零散,为了弄清相关史实,方盛良博士作了非常细密的考证,从而使得理论的生发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这正体现了他所接受的将文艺学的研究建立在文献学基础上的学风。

差不多十年前,我和盛良一起参加安徽大学举办的国际徽学学术研讨会,当时,他曾表达了希望攻读博士学位的愿望,由此我知道,大学毕业后,他虽然留在高校工作,但多年陷于行政之中,深觉与性分不合,于是决定重新开始。我一向认为,人或

许无法完全自主,但完全应该勇于选择。不过,我也担心他受客观条件的限制,难免身不由己。这担心其实是多余的,盛良是笃实之人,他认准的道路,当然会为此付出相应的努力,所以终于在2001年以优异的成绩得偿所愿。这部著作原是他的博士论文,当年答辩时,即得到各位委员的好评,现在经过修订,更加完善,我很高兴他在其治学道路上所迈出的这坚实的一步。最近接盛良来信,云其对世道人心别有所感。我想,人的一生总是在不断超越中前进的。当年,盛良毅然放下种种既得的东西,为自己开辟了别一种境界,那么,现在碰到的一些人和事不过是带给他继续超越的机会而已。因此,我也有理由相信,他不久又会拿出新的成就,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价值。

2008年11月23日

目 录

序	张宏生	(1)
引言		(1)
第一章 徽商与扬州园林		(7)
第一节 “扬州二马”家世与生平考述		(8)
第二节 中国园林文化中的扬州园林		(15)
第三节 清代徽商与扬州园林		(23)
第四节 “小玲珑山馆”		(38)
第五节 小结		(45)
第二章 “小玲珑山馆”筑建的人文情怀与文化生态圈		(47)
第一节 “扬州二马”的人文情怀		(47)
第二节 文化生态圈的结构及运行		(54)
第三节 厉鹗与“小玲珑山馆”		(79)
第四节 樊榭词再论		(91)
第五节 结论与余论		(112)
第三章 文化互动：“扬州二马”与“扬州八怪”		(116)
第一节 “扬州二马”与“扬州八怪”交游考略		(118)

第二节 “扬州二马”的艺术修养与文化消费	(127)
第三节 “扬州八怪”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趣味	(136)
第四节 文化互动的历史与当下意义	(145)
第四章 文化视野中的徽商诗词创作	(148)
第一节 “扬州二马”诗词创作概论	(149)
第二节 序跋文化中的徽商诗词创作	(154)
第三节 文学创作中心和边缘关系中的 徽商诗词创作	(161)
第四节 地域文化交融中的徽商诗词创作	(166)
第五章 徽商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	(173)
——以藏书刻书为中心	(173)
第一节 徽商藏书、刻书钩沉举要	(174)
第二节 徽商藏书、刻书与文化传承	(185)
第三节 徽商藏书、刻书与清代朴学	(197)
第四节 徐响	(206)
附录一 “扬州二马”年谱	(208)
附录二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扬州徽商二家 家藏本辑录	(269)
附录三 厉鹗《樊榭山房集》拾遗	(295)
参考文献	(299)
后 记	(307)

引言

徽商,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指概念,它极明显地带有经济和文化的双重特征。就前者而言,徽商在我国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领域中,扮演过特殊的角色,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的发展演变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对徽商的研究可以使人们从一个侧面窥探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因此,它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人们从经济、历史这两个角度切入,较为系统地研究徽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相对来说,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徽商要显得单薄得多。一个明显的例证是,至今,对徽商的定义虽多有争论,但几乎都在经济史的范畴内进行。这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半个世纪以来,徽商研究重点一直集中在经济史领域,即便对其它领域有所顾及,也属由重点牵涉而来。事实上,徽商不仅是经济和历史的存在,也是一种文化存在。徽商在创造经济财富的同时,除了在徽州故里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业绩外,还在他乡寄情文史,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参与并推动了寄寓地的文化建设,书写了地方文化史上极其灿烂的篇章。这在清代前期的扬州尤为突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尽管对淮南盐商颇为不屑,但也不得不感叹:“然固不能谓其于兹学之发达无助力,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① 所以,我们认为,徽商作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101—102。

为文化存在所凸显的意义,就目前徽商研究情况而论,理应得到重视和弥补。这不仅是因为任何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存在,更重要的是,只有充分认识徽商与其所在地的文化发生了怎样的联系,并理解这种联系的成因和生发的意义,我们才能更全面准确地认识徽商,徽商研究也才能得以进一步地全面和深化。

清代前期扬州徽商文学艺术活动频繁,表现突出的就有江春、程梦星、汪应庚、“扬州二马”、黄晟兄弟和郑侠如兄弟等。为了避免因平均用力而可能导致的肤浅,我们选择以徽商的典型“扬州二马”为中心。“扬州二马”指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他们在扬州的文化圈中位居中心,慷慨组织并参加诗社等多样文化活动。厉鹗、杭世骏、全祖望、汪士慎、闽农、陈章、金农等皆与“扬州二马”深交。我们试图重点通过对个案的深入剖析,以点带面,对清代前期徽商在东南地区的文学艺术活动有一个准确清晰的透视。

就目前所掌握的情况,至今涉及这一研究的主要著作有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韩结根《明代徽州文学研究》,主要论文有桑良志《徽商与扬州文化》、薛锋《清代扬州徽商与扬州八怪》、王成《明清时期徽商对扬州文化发展的贡献》、朱宗宙《清代盐商与戏曲》、卞孝萱《从〈扬州画舫录〉看清代徽商对文化事业的贡献》、冯尔康《明清时期扬州的徽商及其后裔述略》、朱宗宙《明清时期扬州盐商与文人雅集》、刘琼《清代徽商与扬州文化》、严迪昌《往事惊心叫断鸿——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与雍、乾之际广陵文学集群》、范金民《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等。

学界前辈和时贤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徽商在以扬州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的文学艺术活动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开创之功令人

尊敬。但就系统性和深入性而言,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另外,他们所利用的材料多取自一些社会经济史料,而对徽商及其友好的诗文集少有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研究手段和成果的丰富性。注重这类诗文集,也许能让我们更接近在扬徽商的文化生活实际状况,并作出更合乎情理的判断。我们希望在尽可能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以“扬州二马”为代表的徽商与东南地区文学艺术的关系,进行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这包括:对“扬州二马”家世和生平的考述;对“小玲珑山馆”作为扬州园林文化和学术文化象征的双重存在的探讨;团结在“小玲珑山馆”周围的寒士诗人群体出现的成因、状况和意义;以“扬州二马”为代表的徽商与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诗人画家之间的文化互动发生机制及影响;徽商藏书刻书等文化行为与东南地区学术研究与文化遗产的关系;徽商诗词创作的面貌、成因及其在文化视野中的价值。从而以点带面,对徽商与东南地区文学艺术的关系进行宏观把握。

徽商的发展沿革贯穿明清历史,不同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我们拟定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研究的主要时间范围。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清代前期,是有清一代国力最为鼎盛的时期。在当时的经济发展中,徽商占有重要的地位。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东南地区,无不渗透着徽籍盐商的势力。二、徽商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历经起步、兴盛和衰落。纵观这一发展史,清代前期毫无疑问当为徽商发展的辉煌期。对这一横断面的切割分析,具有研究徽商的典型和普遍的双重意义。三、传统文化在清代前期得到空前清理的同时,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难。爱新觉罗王朝在完成对异族的统治和疆域的统一后,便寻求对异族思想心理上的征服。他们

清醒地认识到,沿袭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的稳固性甚至强至不可抗拒,要想在思想上得到真正的统一,只有以文化为突破口。于是,在文化上奉行怀柔和高压并用的政策,一方面以整理古籍笼络文人,让他们沉浸在由文献所营造的、为他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化氛围内。典型莫过于《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编纂。另一方面,从南山案起,文字狱迭兴,几乎没有消歇。因此,大批的文化人被推向或自动退往社会的边缘。清统治者所奉行的思想文化政策和行为,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社会群体乃至个体,徽商自当其冲。作为在经济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徽商,面对这一严酷的政治文化态势,以怎样的心理状态去面对?是仅为商人的一己之利而趋炎附势,还是坚守长期形成的儒家情怀?他们对所在地的文化态度和相关行为将是最好的回答,努力寻找这一答案,使其由隐而显,无疑能够使我们在逼近清代前期东南文化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对徽商的文化心理发展的脉络有一个更为亲切准确的把握。

扬州有着丰厚的文化传统,人文气息代有传承发展,在整个东南地区享有盛名。虽因战火屡遭摧残,但这种文化传统仍以其特有的秉性生生不息,每逢一定时机,便繁衍再生辉煌。这在清代前期尤为彰显。清初扬州虽历经“屠城十日”,但伴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其因长期积淀而固有的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再次得到证明,这个时期的扬州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多元性和前瞻性,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并且,成为我国有清一代封建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从清政府设局编刻《全唐诗》、红桥修楔,到私家编书、藏书、刻书、文人酒会;从书院的复兴发展到当时一流文人学士的云集,还有那林林总总、屡为后人津津乐道、明显渗透有新安文化的园林,以及在艺术方面颇有创新的

“扬州八怪”的产生等等,无不在这一地区显示出茁壮的活力。所有这一切至今仍令人沉思警醒。一个地区的文化一旦具有某种特质的稳定性,就必然反过来作用于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们,而具有一定文化修养者对这种反作用的领受尤为敏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滋润和培育。带有浓厚儒家气息的徽商在参与扬州文化创造的同时,也自觉地浸润在扬州文化氛围之中,与生活在扬州的文人士子一样,努力塑造自己的人文情怀与文化品性。这种人文情怀与品性相互作用,良性循环,不断地发生积淀在扬州这方土地上,丰厚着扬州的历史文化传统。其所具有的影响力广深久远,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畴。当然,这些不可能都进入我们讨论的范围。就文化而论,乾嘉学派精审征实的朴学之风、扬州学派的蔚为大观等更与之有直接的因缘;后来文汇阁建于天宁寺,奉谕储藏《四库全书》、仿宋版《五经》、《平定准葛尔回部》、《两金川得胜图略》各一部,皆凭其文化底蕴和徽商贾而好儒的特性。另一面,其时,作为东南地区的重镇——扬州水陆交通发达,成为盐业等最主要的集散地。商业中心的地位,吸引集结了当时各种商人,徽商更是首屈一指。很显然,以上两个方面使得扬州与徽商的关系非常密切和特别。当然,徽商在清代前期的文化活动遍及全国,但与扬州比较,其在其它地域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影响已经大为弱小,尽管徽商与本土的联系依然紧密,如参与故里的各种物质文化建设等。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在确定徽商与东南地区文学艺术研究时,将研究主要地域落在扬州,而不是徽州本土或其它地区。

为了使以上思考能够顺利进行并得到较为平实的结论,我们力求所有的思考都尽可能立足于文献,这不仅包括前人研究关注最多的经济历史材料,还包括多被忽略的时人众多的诗文

集。由于材料的缺失和历史的不可重复性,有关研究对象的某些具体事实在已经相当模糊甚至空缺,如“扬州二马”的家世、生平交往都少有直接准确的记录,而这些内容是以上思考链条中不可断裂的一环。因此,凭借已占有的材料进行相关的考索求证,既是我们写作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写作的基点和重点之一,“扬州二马年谱”即是这种工作的主要体现。为了更好地凸显徽商和扬州文化的关系,也是为了具体的认识和理解更为深入和切合实际,我们试图在东南学术文化史和新安文化传统的双重背景下,对前述问题进行论述,这是写作的又一个主要方法和基点,本文主要章节将始终贯穿着这样的思路。

第一章 徽商与扬州园林

从被誉为“东南邹鲁”^①、“朱子阙里”^②的徽州走出来的徽商,在追求商业利润的同时,也在客乡不遗余力地参加物质文化建设,为所在地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人生价值也随之在精神层面得以扩张实现。“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的传说,即是人们对徽商物质和精神双重行为的公认和礼赞。这种城市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景观,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突出,明清时期扬州的空前繁华即为一个显例。时序更迭,沧海桑田,历史因必然的刷新而不断模糊着既往的痕迹,扬州徽商中的翘楚们及其营建的家园,已不可避免地逐渐失落在后人记忆的荒漠中。然而,对历史上这一特殊现象略作回观,我们发现,仅就徽商史和城市发展史两点而论,这种模糊与淡忘便显得极为不公。因此,我们在开始进行本课题研究前,力求通过对文献考索,在最大程度上复活这种遗忘的记忆。

① 弘治《徽州府志·风俗》卷一曰:“(徽州)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称为‘东南邹鲁’。”

② 康熙茗州《吴氏家典·序》曰:“新安为朱子阙里,而儒风独茂,岂非得诸私淑者深欤!”

第一节 “扬州二马”家世与生平考述

“扬州二马”为乾隆年间,时人对扬州徽籍盐商昆仲马曰琯、马曰璐的合称。其祖籍徽州祁门,承祖业业磋于扬。兄马曰琯(1688—1755),字秋玉,号嶰谷、沙河逸老。弟马曰璐(1695—1769后)^①,字佩兮,号半查、半槎、南斋。他们互为师友,研习经史文集,旁逮金石字画,俱以诗名。又筑“小玲珑山馆”,藏书甚富,礼遇寒士,慷慨于公益事业,多善举义行。因此,马氏兄弟颇得时名,为人敬称“扬州二马”^②。

一、家世

“扬州二马”先祖可远溯到先秦战国时期。本姓赵,赵奢即其先人,因赵奢号马服君,其子孙因之姓马。而载籍著录马氏姓名和事迹者,亦可追至西汉时的马援祖先三代。《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曰:“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将,号曰马服君,子孙因为氏。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罗反,被诛,故援再世不显。援三兄况、余、员,并有才能,王莽时皆为二千石。”^③马援宽厚骁勇,率军转战于陇陕间,危难之时,屡建功勋,曾被“封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所以,杭世骏曰:“(马曰琯)姓马

① “扬州二马”生卒年详参本书附录一。

② 《扬州画舫录》卷四曰:“马主政曰琯字秋玉,号嶰谷。弟曰璐,字佩兮,号半查……与兄齐名,称‘扬州二马’。”其生平详参以后章节。

③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